

從人民自決到獨立建國：以後殖民觀點分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解嚴後三十年發展

邱凱莉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提要

本文旨在梳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自解嚴以來 30 年來的主題 (motif) 發展及其影響。作者分析四個代表性的文本：《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王憲治, 1988)、《奔向出頭天的子民》(黃伯和, 1991)、《認同的神學》(陳南州, 2003)、《台灣建國神學》(羅光喜, 2018)，論述長老教會政治意識的發展理路，沿著鄉土認同、人民自決出頭天意識、台灣人認同塑造，逐漸發展出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意識。

作者從抵殖民抗爭的觀點來分析長老教會長期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的緣由，以及長老教會神學工作者如何從聖經出埃及人民解放的神學論述，發展出人民解放自由的上帝國在台灣的 political 神學論述，如何貢獻於本土認同的深化，以及裨益台灣人認同的塑造。另一方面，作者亦分析長老教會的政治神學如何從出頭天神學倡議的三個面向理想：政治-社會、文化、心靈-靈性的出頭天，窄化為政治-社會的面向的出頭天 (獨立建國理想)，忽略了文化認同重塑、以及人民心靈解殖民的面向。本文最後建議長老教會政治神學從抵殖民抗爭—國族論述軸線轉向解殖民重構主體軸線，亦即強化論述抵殖民抗爭運動中對差異本質化的批判、並提出重構台灣主體意識、想像力解殖、提出新的宗教意象以凝聚社會的論述，作為未來政治神學發展的主題。

關鍵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後殖民主義、人民自決、獨立運動

投稿時間：2020.12.21；**接受刊登：**2021.04.12；**責任編輯：**潘馨逸

前言

1987 年 7 月 14 日，總統蔣經國頒布「台灣地區解嚴令」，宣布台灣自 7 月 15 日凌晨起解除戒嚴令，長達 38 年 2 個月的戒嚴令從此正式走入歷史。¹ 自 1987 年解嚴至 2017 年滿三十年，期間台灣經歷了重大的民主進展，包括總統直選（1996），以及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2000、2008、2016）。在民主先生李登輝前總統的領導之下，經歷了寧靜的民主革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黨外時期即活躍於抗爭運動的場域，在民主化的過程也扮演了重要的倡議角色：除了在 1970 年代發表石破天驚的三大宣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1）、〈我們的呼籲〉（1975）、〈人權宣言〉（1977），並繼續在 1991 年發表了〈台灣主權獨立宣言〉，及在 2005 年發表了〈公義與和平宣言〉。前者除了明確主張「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主權獨立國家」外，更主張制憲、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確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後者則為前者的再度強調，並呼籲制定「台灣國與中國關係法」。²

自 1987 年解嚴之後，系統化的國族運動抗爭神學論述陸續出版，包括 1988 年的《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1991 年《奔向出頭天的子民》、2003 年《認同的神學》、以及 2007 年的《台灣鄉土神學》，與同年度出版的《臺灣·新而獨立的國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

2018 年《台灣建國神學》正式出版，內容詳述符合基督教長老宗價值觀與理想的國家，包括民生經濟、人民、軍事國防、政府組織、國際關係、人權等具體的國家架構。標誌著一個新的里程碑，亦即，台灣解嚴後三十年，長老教會的政治神學論述從人民自決到獨立建國的理想，從宣言式的呼籲落實到具體化的國家藍圖意象。然而，獨立建國是否能夠等同於台灣人民的救贖，是否代表著基督宗教的價值觀能夠落實在台灣的理想？又，獨立建國的神學論述與其所倡議的願景是否足夠來帶領台灣另一個三十年的發展，帶來人民的自由解放？

¹ 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台灣地區解嚴令」，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16>

² 相關重要文獻請參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網站(首頁 > 關於我們 > 基督長老教會 > 重要文獻)。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

本文主旨梳理長老教會的政治神學自台灣解嚴後三十年以來的發展，並採用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的發展背景、主題以及其影響。本文採用的「後殖民觀點」指的是一種抵抗殖民主義的立場。在定義上，「後殖民」可以指時間上的「後」，也就是殖民地重獲主權以後，國土脫離殖民宗主國統治，成為獨立的軍事與政治實體的歷史時期；也可以指一種抵抗殖民主義的立場，亦即一種論述空間的伸展。(Sugirtharajah, 2003: 4) 後殖民不能被簡化為政權的移轉，(Loomba, 2015: 31) 更重要的是對殖民控制 (colonial domination) 以及殖民遺緒 (colonial legacies) 的論爭 (contestation)。(Loomba, 2015: 32) 在最廣義的定義上，後殖民可以指涉被殖民者從各式各樣的殖民症候群解脫出來、一系列無可避免的過程。(Loomba, 2015: 38)

本文使用「政治神學」³ 來描述長老教會在特殊政治處境中發展出來的處境化神學。筆者沿用 Mark L. Taylor 的觀點，政治神學並不是神學的次領域，神學本身就含有政治性。(Taylor, 2013: 83) Peter Scott 與 William T. Cavanaugh 認為，政治神學是從不同的神學觀點來進行對於政治生活安排的分析與評鑑。(2004: 1) 需注意的是，所謂的政治不能被窄化理解為組織化政治，例如國家、政府政策、政黨政治，而必須更廣泛理解為人類受到社會歷史所模塑的本體結構影響的狀態。(Taylor, 2011: 5-6) 政治神學的任務在於追溯並且理論化個人與群體如何受到政治的支配以及所導致的脆弱性與社會受苦；政治神學必須要面對造成人民受苦的結構性力量，例如階級、帝國、種族、性別、國家等，並且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結構可能作為解答。政治神學的倫理即是提供新的形塑人民的結構的可能性，並將解放的任務作為神學最優先的承諾。(Taylor, 2013: 83-85) 由於台灣的政治處境，台灣的神學不僅從抵抗運動發展出來，更將人民解殖民解放的主題作為處境化神學最重要的神學主題。由此發展出的神學帶有深刻的政治性。也可以說台灣在政治處境中發展出的抗爭神學即是政治神學。

本文首先分析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發展的歷史脈絡，簡要敘述其政治神學

³ 筆者對於政治神學的定義，主要參考美國學者 Mark Lewis Taylor 的論點，以及 Peter Scott, William T. Cavanaugh 對政治神學的觀點綜合發展而成的。

如何從抵殖民人民抗爭運動中發展出來。接著分析台灣政治神學重要的文本——1988年的《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1991年《奔向出頭天的子民》、2003年《認同的神學》、以及2007年的《臺灣·新而獨立的國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與2018年《台灣建國神學》。文末提出後殖民觀點的神學反思。

壹、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發展的歷史脈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政治神學是對於殖民處境的回應，源自於抵殖民人民抗爭運動，也隨著台灣歷史的脈動而發展。台灣在日據時期完全淪為殖民地社會。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同文同種的台灣人起初擁抱這個新的政權，以為可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政權。然而，國民政府的對台政策，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來統治相對位居於中原邊陲的台灣，以台灣作為「反共復國」的跳板，作為國共內戰的軍事基地，並非以台灣作為政治主體來規劃其政策。在此脈絡之下，台灣人感受到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以及貪汙腐敗的現象。此外，治安惡化，1946年社會經常發生軍警和民眾衝突事件，社會動盪不安。（李筱峰、薛化元，2019: 21-25）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腐化的國民政府統治失敗所造成的悲劇；隨之而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徹底暴露了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心態，證明了該政權的殖民性格。正是這個時代悲劇觸發了台灣人的覺醒意識，陳芳明就認為，以「再殖民時期」替代「戰後時期」，應該可以較為正確看待1945年之後的台灣社會。（陳芳明，2011: 27-28）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可以看做是一種移民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後殖民研究學者 Ania Loomba 定義移民殖民主義為：殖民者大量移民，與當地居民混居並使之屈從，並製造複雜的種族階級秩序。移民殖民主義可能造成對當地居民大規模的殺戮（decimation）以及貧民化（ghettoisation）。（2015: 24）政治學者吳叡人也以「遷占者國家」來描述蔣介石制下的台灣，其統治乃是建立在軍警與特務系統的恐怖統治，充分顯現出移民殖民主義的性格。（2016: 49-51）

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期，長老教會亦受到國民政府的壓迫與監控，

在祕密警察與情治人員網絡之下被嚴密監視著。其他政策包括：禁止母語事工（1957）、沒收聖經聖詩（1969-1975）。（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1996: 31-40）1974年，在禮拜儀式進行中警察強行進入教會，帶走泰雅語聖經及聖詩，1975年1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沒收台語羅馬字聖經。（李筱峰等，2019: 89）也因此長老教會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張。但教會在白色恐怖時期因遭受嚴厲地迫害也曾一度噤聲不語。

雖然在政治上遭受迫害，長老教會在1955-1965期間的倍加運動，不但增加了教會的自信，教會也因為到偏遠鄉村佈道，因而加深了本土化的潛力。另一方面，長老教會牧者常有機會出國訪視，也因此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民主思想。這些因素加上處境化神學方法的影響，以及改革宗傳統本身蘊含的改革動能，逐漸累積出長老教會的潛在能量，讓教會開始關心公共議題，例如，社會變遷、勞工、漁民、人權等重要議題。（蔡榮芳，2020: 272-275, 279-283）

自1970年代開始，長老教會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張力極大化。這是因為長老教會經歷倍加運動累積了一定的政治抗爭動能；另一方面，由於長老教會參加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自1961年開始接納共產國家會員，長老教會成了「反共至上」的蔣介石政權的眼中釘。自1967年開始，蔣介石政府認定普世教協為一個「容共組織」，與其所推行的反共政策不合，因此強迫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而長老教會迫於情勢竟也在1970年總會臨時年議會中表決通過退出普世教協。（後來在高俊明牧師的努力之下，於1980年重回普世教協）。（鄭仰恩，2005: 241-244）

1971年10月25日，蔣介石政府治下的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的國際情勢相當危急。長老教會於當年年底發表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裡面明確主張人民自決（與國會全面改選）：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只顧私利而作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⁴

該聲明一發表，總會辦公室以及相關的牧長即立刻受到監控，許多人因

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取自2020年10月31日，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1

此寫好遺書，準備犧牲生命。（林芳仲，2007: 339）

1975 年，原住民聖詩以及台語聖經被統治當局沒收，國民黨政府加強對本土文化的箝制，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裡面訴求政府：一、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二、突破外交孤立困境，三、建立政府與教會間之互信互賴，四、促進居住在臺灣人民的和諧與團結，五、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利。在這份聲明之中，也不只是針對時事給予建議，也呼籲台灣全體教會做自我更新，包括：一、發揚誠實與公義之精神，二、促進教會內部的團結與堅守教會立場，三、謀求教會的自立與自主，四、建立與全世界教會密切的關係，五、關心社會的公義問題與世界問題。⁵

1977 年，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就雙方關係正常化交換意見，有鑒於當時國際局勢，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主張：「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同時，「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⁶ 該聲明發表不久後，政府不但沒收當期《台灣教會公報》，更經常找教會領袖的麻煩。

自 1972 到 1980 年間，幾位基督徒領袖：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宋泉盛，在海外發起「臺灣人民自決運動」。「自決運動」的主要活動者分散在世界各地，為了爭取國際支持台灣追求普世價值（民主自由、自決、平等、尊嚴等）。（蔡榮芳，2020: 353）先後出版了十一期雜誌《出頭天》（*Self-Determination*）。在第一期的《出頭天》，宋泉盛清楚地闡明自決運動的核心目標，即是要幫助以及保護台灣人民擁有自決的權利，因為人是上帝所創造，人有上帝的形象，自決的權利是上帝所賜的。該運動的核心領導並強調，該運動的目標為：（1）表明基督徒對臺灣人權問題之堅決立場。（2）促進臺灣人民在政治上自主自決。（3）為建設自由民主的臺灣社會努力。（宋泉盛，1988: 21）

1972 年底，以黃彰輝為首的自決運動發起人，用英文起草一份〈台灣人

⁵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們的呼籲〉，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3

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5

民自決運動宣言：我們基督徒的立場），聲明台灣人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神聖權利和自由。1974年2月28日到3月3日，自決運動在德國的伍伯塔巴門舉行協議會，名為「今日臺灣人民的拯救」，是該運動一次最重要的集會。會議之後發表了台灣版的巴門宣言〈我們對台灣前途的聲明〉，再次重申台灣人民有自決權。（蔡榮芳，2020: 354-358；宋泉盛 1988: 34-37）

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的發展：抵殖民國族抗爭論述分析

台灣的政治處境迫使台灣的神學工作者必須發展新的神學方法論來面對嚴苛的處境。當時的教會界聲望領袖、同時也是神學家的黃彰輝(1914~1988)，首先提出實況化的方法論來重新思考神學。1970年，黃彰輝應邀至普林斯頓神學院進行三場演講，在演講中即提到，基督徒涉入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並不在於可不可以涉入政治，而在於基督徒必須秉持著為受苦的人伸張正義、為全世界公民社會謀求福利的精神準則來涉入政治。（蔡榮芳，2020: 305-308）而黃彰輝更早在1953年即提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福爾摩沙」、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主張。此一主張具體體現於1964年由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所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裡。（蔡榮芳，2020: 289）

1973年，黃彰輝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處境化神學〉，主張第三世界的教會首先需要將西方教會及其神學「去處境化」，並在自己的處境中將信仰和神學「再處境化」，以建構第三世界神學的主體性。黃彰輝描述「處境化」的神學方法是持續不斷在經文（the text of the Christian Scripture）與處境（context）中不斷地互動去產生新的聖經詮釋。黃彰輝認為真正的神學反思只能在處境中產生，強調基督教福音的處境這個向度。成為一個忠誠的基督徒意味著認真地解讀社會政治處境，辨別時代的徵兆並且根據自身的處境來做批判性的神學反思。把基督教神學看做是處境化的，就是認真地以看待基督教福音的處境面向，並以批判性的神學思考來作回應。（1980: 52-53）

黃彰輝也敦促長老教會不只要面對社會政治處境，也要成為一個處境化的教會，不只要能夠正確地解讀時代的徵兆，也要投身在採取適當的行動來改

革社會。也因此，「處境化」跟「改革」成為一組相互關聯的概念。而對黃彰輝來說，當時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國族身分認同的問題，因為這個認同會決定社會生活整體的全部面向與結構，也因此這個認同會成為一種協調全部的原則。也因此，成為基督徒與成為台灣人對黃彰輝來說，是一樣重要的，前者指向文本，後者指向處境。黃彰輝認為成為基督教會不能逃避責任，必須要去詮釋在福音光照之下，成為台灣人的意義為何，並且，如何將這些神學洞見與信仰反思轉化成為具體的行動，這樣才能夠忠誠地回應上帝的呼召。（1980: 51-53）

黃彰輝對於處境化神學的提倡促成了台灣長老教會界與神學界對於「認同」（identification）、「鄉土」（homeland）、「自決」（self-determination）以及「出頭天」（Chhut-Thâu-Thiⁿ）等主題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促成了以下的實況化神學思考：同時成為台灣人與基督徒的意義是甚麼？如何面對基督教信息的外來性，並且將之適當地轉譯，讓它對台灣的實況說話？聖經對於台灣長期在國際上被孤立、歷史上被殖民被壓迫的處境提供甚麼樣的回應？基督教福音與文化的關係為何？受到黃彰輝的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兩個主要的神學發展，其一是基督教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其二則是促成了台灣政治神學的興起。以下介紹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發展，所選擇的文本以抵殖民國族抗爭論述為主要分析對象。

一、鄉土神學

1970 年代開始，蔣介石政權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與其所代表中國的立場，在國際社會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島嶼上的威權殖民體制也逐漸鬆動。在權力支配系統出現裂縫之時，台灣作家紛紛於文學中表達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懷，鄉土文學運動從缺口中逐漸生根茁壯。（陳芳明，2011: 3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於「鄉土」的神學與信仰關懷也在這個時期逐漸蓬勃發展。自 1971 到 1977 發表了三大宣言之後，於 1979 年第廿六屆總會提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草案。（黃信恆，1988: 387）

自 1979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草案列入「鄉土」這兩個字以來，一直有質疑的聲音，因為這個字眼實在是太敏感了。直到 1985 年總會年

度議會才正式通過。長老教會認為，人權與鄉土都是上帝所賞賜的。在信仰告白中提及「鄉土」，除了是堅決主張人民完全擁有對「鄉土」的權利、無人能夠剝奪以外，更重要的，人民有權拒絕外來不尊重當地人民的政治安排、拒絕把台灣「鄉土」視為國際利害關係的交易品。（黃信恆，1988: 388）

1988 出版的《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是在解嚴之後、威權體制鬆動、統治權力缺口中生根茁壯的神學作品集。受到黃彰輝「處境化神學」的啟發，在王憲治牧師（1941~1996）帶領下，《鄉土神學論文集》由台南神學院一批願意投入神學反思的工作者共同完成。該論文集除了反映長老教會自 1970 年起對於國家、鄉土、人民、以及普世價值的信念以外，更細緻地從《舊約》到《新約》論述聖經對於人民奮鬥的啟示。《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是解嚴之後長老教會界第一本出版的政治神學系統性論述，以台灣本土意識認同對抗大中華民族主義認同的抵抗論述。論述核心為：

土地是上帝所賞賜，在歷史進程中上帝以「約」（covenant）來跟祂的百姓互動，並在歷史過程中不斷施行拯救的工作。

論述軸線從挪亞之約開始，接著是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大衛之約、第二以賽亞中新的揀選與新出埃及，一直延續到在基督裡的新約，論證聖經一再啟示，上帝是一位在創造與拯救中運行的上帝，也是台灣人民可以倚靠的上帝。在島嶼上的人民必須以公義和慈愛來重建政治、社會、經濟秩序，鄉土才能有長久的平安。（王憲治，1988: 23-26）

王憲治從台灣歷史中觀察到，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以及國民政府「再殖民」威權統治，台灣人民不管是在種族、文化、政治、宗教上都產生了認同混亂的現象。王憲治認為，台灣的鄉土認同問題必須從基督教信仰來回應。他並提出鄉土神學的四個神學主題：「人民」、「土地」、「權力」、「上帝」作為抵抗殖民威權體制所造成的認同混亂問題。

（一）人民：鄉土神學把神學的主題從「統治者」置換成「人民」，連結到亞洲處境中廣大受苦的人民，重新敘述聖經的故事為一部上帝解放受壓迫人民、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成為人民，與人民一起受苦並帶來解放的故事。鄉土神學肯定人民的身上有上帝美好的形象，但也承認人性因扭曲的統治而扭曲的現

象，必須從深切的歷史反省中重新人民的被殖民性——亦即認識台灣人民性格如何在數百年間逐漸變成貪生、怕死、大頭病的奴隸性格，並重新連接於人民自身本有的內在神性（上帝的形象），方能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擺脫長年被殖民的悲苦命運。（1988: 20）

（二）土地：二次世界大之後，英、法、德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唯獨台灣卻再度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的威權殖民統治，國際地位也一直曖昧不明。王憲治指出，「台灣鄉土神學有別於拉丁美洲之解放神學，有別於韓國之民眾神學，乃在於土地認同的神學主題乃台灣所特有者。」（1988: 21）鄉土神學因之主張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土地前途，並歡迎所有的族群一起來建設這塊鄉土。（1988: 20-21）

（三）權力：鄉土神學大膽處理敏感主題——「權力」，跳脫舊思維中毫無反省地以合理化「王權統治」（君權神授），以及任何無限上綱統治權力的意識形態窠臼，邀請人民學習耶穌的典範，挑戰權力的腐化與濫用，重新主張權力應該用於服務人民。這樣的神學思想有助於賦權始能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民，鼓舞人民重新主張自己的政治權力，健全對權力的觀念，讓政治權力用於服務人民而不是蹂躪人民。（1988: 21）

（四）上帝：既然人權是由上帝所賦予，那麼，正確的上帝觀是重要的，因為人民身上有上帝的形象。王憲治在鄉土神學中提出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觀——上帝是一位神聖與慈愛的上帝，充滿了公義與憐憫，樂意將人民從受壓迫的處境中拯救出來的上帝。王憲治並批判當時的台灣民間宗教信仰，認為民間信仰多注重個人福氣、講究宿命論，少數主張道德教化，但基本上缺乏對權力的批判與人權價值的追求，因而無法提供抵抗威權殖民政權的思想資源或者組織化的動能。甚至有些民間信仰有將政治人物神聖化的危機（例如蔣公王爺）。因此，如何有正確的信仰價值觀，從根本的信念上「除偶像」是台灣人民重要的課題。（1988: 21-22）

鄉土神學可以說是台灣人抵抗威權殖民體制的思想利器。首先，神學的中心不再是「統治者」以及其所代表的權力體系、價值觀、認同，而是充權人民，鼓舞每個人連結於自身神性形象，恢復人性尊嚴，勇敢抵抗不正義的統治權力，並且充分尊重島嶼上的人民，共同建設這塊鄉土成為符合上帝國價值觀（人權、自由、慈愛、公義）的美麗土地。其次，以「鄉土」作為神學反省的

中心，有助於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形成，並且抵抗大中國民族主義所提倡的「反攻大陸」的政治目標，抵抗中國認同中把台灣邊陲化的意識形態。第三，重新塑造新的價值觀，透過基督教神學來表達，並提供「權力正當性」的神學論述，提供人民批判世俗統治政權的立足點，同時賦與政治抵抗運動的動能。

然而，鄉土神學亦存在一些理論上的缺陷，例如，政治民主化理論的薄弱，仍存在三民主義的遺緒，（1988: 59-62, 65-66）以及對於亞洲多元宗教、台灣民間宗教的批判態度，質疑亞洲文化是否具備解放人性的特色，（1988: 10）忽略了基督教本身也是一個從亞洲發展出來的宗教。另外，由於鄉土神學是一部論文集，其神學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對於鄉土的論述並不穩定而一致。例如，鄉土神學論述以色列民族史中上帝賞賜的「土地」其實是有具體明確的疆界的，但是，有部分的論述將「鄉土」連結到耶穌的上帝國，卻是接近大同世界的理想，而無具體明確的土地邊界。（1988: 225-233；313-339）綜上所論，對於台灣鄉土的認同實際上是源自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蔣介石政權及其代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緊張關係，人民的抵殖民抗爭運動，以及整個解嚴之後的時代氛圍。不過，鄉土神學作為抵殖民抗爭運動的宗教思想資源，確實為台灣的政治神學開啟了新的篇章。

二、認同神學

繼《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之後，《認同的神學》是系統化論述文化認同、身分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神學著作。《認同的神學》是神學論述文章的集合，從聖經詮釋的方法論探討「認同」的神學課題。陳南州的神學方法論特別注重聖經詮釋。「認同」的尋求必須不斷地從事建構、解構與再建構。此方法論根據台灣的實況賦予信仰的詮釋，特別要扣緊詮釋者的處境來詮釋聖經經文，經文的世界與讀者的世界必須能夠相互關聯、相互對話、相互影響，從而激盪出新的福音信息。陳南州的認同神學裡，所處理的認同，除了身分認同以外，也同時指一種政治立場，也就是認同受壓迫的人民，以此做出來做聖經神學詮釋以及信仰的回應。陳南州並認為，基督教聖經就是一部上帝認同人類的苦難的故事。

《認同的神學》沿著兩條論述主軸發展：（1）認同是台灣各種神學工作

的共同議題與進路，(2) 認同是聖經故事的主題。(2003: 21) 陳南州認為「認同的危機」是台灣人民的生活實況：政治認同的模糊、經濟認同的短視、教育認同的錯誤、文化認同的困惑以及宗教認同的隨便等現象，而這些認同錯亂又密切關聯、交互影響。(2003: 55-58) 因此，認同神學是延續和深化鄉土神學的關懷，並且，「認同」這一主題成為在台灣實況中作神學反省的中心主題。(2003: 21)

除了形塑個人認同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結構性因素，宗教也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結構。陳南州論述宗教認同的雙重性：以基督教聖經中的「出埃及敘事」提供「認同受壓迫者」的神學基礎，據此作為人民解放的動能，從而，人民得已找到新的宗教認同。(2003: 21-22) 陳南州認為，創造主上帝在以色列歷史中藉由選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法老王的奴役，彰顯祂公義與慈愛的本性。以色列人因著上帝認同的作為得到新的身分認同，並且也以認同上主律法的價值觀與內涵作為回應，以它作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行為的準則，並據此創造新的文化、新的社會。(2003: 22) 除了舊約聖經中的出埃及敘事，新約聖經的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也是上帝認同人類的具體表現。陳南州認為，耶穌的認同作為更新人類的生命，使人類重新獲得人性價值與尊嚴，也因此獲得受壓迫人民對耶穌與他所宣揚的上帝國遠景的認同，願意為實現上帝國來努力。(2003: 22)

陳南州將台灣的本土神學看作是認同台灣人民苦難的盼望的神學。神學的任務是在台灣的歷史與文化中努力去辨識神學的意義，並在台灣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等生活實況中去作神學。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民在追尋公義、解放、自主的尊嚴的過程中，認同是關鍵的因素。認同是台灣本土神學的核心課題，認同的神學意涵是基督徒在台灣處境中必須被探討的。(2003: 21)

《認同的神學》雖然遲至 2003 年才出版，但內容收集了陳南州在 1996~2003 年間發表的論文。2000 年本土政權第一次執政，然而，蔣介石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持續壓抑著本土語言以及文化，因而，認同台灣本土的歷史敘事、歷史敘事、以及台灣本土語言文化，成了一種對抗主流霸權認同的文化抗爭論述。

解嚴之後，台灣社會力爆發，性平、勞工、環境、農民運動，以及族群平權運動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長老教會內部亦有原住民族認同的抗爭與神學，

平行於漢人的國族認同抗爭運動在發展。自 1988 年開始到 1993 年間三波的還我土地運動，長老教會扮演關鍵的動員與組織的角色，從族群平權運動產生了可觀的原住民族神學論述。這波神學建構主要以玉山神學院為中心，並受到處境化神學的啟發，原住民族神學工作者致力於解構不能實踐或者與現況不符的神學，努力建構土地、身分認同、原住民族自治以及文化詮釋的神學。

從後殖民的角度來看，威權殖民體制所造成的認同議題，不但在政治認同上反映出來，更在文化認同上表現得相當徹底。在台灣當代，仍存在著政治認同台灣、但文化認同自身為中國人；或者，上一輩的台灣人許多仍同自己為日本人。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現象。筆者並不是要主張某種認同才是政治正確的認同，而是要說明殖民體制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所造成的認同危機，一直到政治脫殖民之後還繼續著，可見其影響之深遠。認同神學的價值並不只是在陳南州的時代，其實，今日的台灣持續面對著認同的課題。特別，當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有多重的認同，各種認同之間有著矛盾時，其神學的課題將更為複雜。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如果抽離「認同的危機」這個時空背景，以及陳南州在認同神學裡所探討的認同混亂、認同錯誤等問題，會誤以為認同的神學是要毫無條件地認同台灣本地的文化，而不加以篩選。

三、出頭天神學

由於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匯聚出的抗爭文獻以及長老教會相關的聲明，促成了 1991 年《奔向出頭天的子民》的出版。黃伯和取材台灣俗語「出頭天」來做為上帝拯救與解放的象徵。該書把台灣人民自決出頭天的奮鬥連結於人類終極關懷的宗教意象，賦與新的神學動能。

黃伯和取材於台灣民俗諺語「出頭天」作為「拯救」的象徵。他定義「拯救」為把人從各種非人性化的處境中拯救出來，使其恢復具有上帝創造形象的人性尊嚴。「基督徒視『人性化』為：『以基督的人性做衡量，來幫助人無論男女都能成長，達到整全境界的一切事。』」（1991: 54）相當重要的是，黃伯和論述「出頭天」與台灣民俗用語「出頭」的不同：

「出頭天」之詞雖發展自「出頭」，其詞義卻與「出頭」不同，不但獨立於「出頭」，「出人頭地」等民本思想的解放意涵，更超出詞典

載明之意義，而向台灣人民之新的解放經驗與盼望開放。就字義內涵而言，「出頭天」既意在達成頭與天之高且獨之最高的解放目標，乃是最完整的，不受任何範圍所限制、界定的解放，它必不能忍受、停留於受限定，或以改善處境為已足的民本式解放。（1991: 85）

在神學方法上，黃伯和取材出埃及敘事來做為台灣人抵殖民抗爭、出頭天的神學素材，論述台灣人民政治解放的神學面向。黃伯和並以耶穌已承擔人民的苦難，並且賦權使能給人民，來建立上帝國盼望（彌賽亞政治），作為出頭天的終極盼望的面向。黃伯和的出頭天神學分為三個面向：政治——社會、文化、宗教——靈性（心靈）。

黃伯和分析出頭天的意涵，採取其中「脫離苦難」的部分來銜接台灣人渴求脫離殖民壓迫、威權控制的苦難。「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既然蘊含有台灣人民「出頭天」得解放的奮鬥與盼望，那麼，受召在台灣人民當中宣揚福音之拯救信息的台灣教會，乃不能忽視這段血淚斑斑的台灣歷史，試著穿透上帝藉著這段歷史所要對台灣子民的啟示。」（1991: 124）黃伯和也將「出頭天」的典故連接於自 1973 年開始由宋泉盛等人發起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該運動的刊物，中文名稱即為《出頭天》，英文名稱卻以「自決」（Self-determination）命名之，也可以說，以「出頭天」作為人民解放的象徵語言，是與人民自決抗爭運動的目標相呼應。（1991: 85）因此，出頭天神學的政治——社會面向，與抵殖民抗爭／民族自決相結合。

黃伯和也批判出頭天的功利取向的部分，為求生存而抗爭卻淪為內鬥的的弔詭文化現象，乃出自於：

台灣人民的抗爭奮鬥乃是建立在痛苦經驗的直接反應，以求得現狀解脫為主要目標，在形式上有某種程度的被動性質，較不是以人民為主體，從人之價值與尊嚴去從事思考與探尋，為使人民有決定命運、生活形式的自由而奮鬥，較是以人民為客體，只求改變苦難現狀存活下去（to be），而不是成全人生應有的理想與當家做主的抱負（ought to be）。（1991: 162）

黃伯和因此倡議一種新的自決出頭天文化，裨益於建構台灣人民的主體

身分的建構，兼具「自我身分認同」與「決定的自由」，來孕育新人性。(1991: 168-170)

黃伯和從上述的批判帶出「出頭天」的終極盼望面向，是指向「上帝國」的盼望。他論述猶太人的救贖歷史，從出埃及事件到建立王國到耶穌的上帝國，顯示出上帝的救贖計畫超過俗世的政治範疇，也就是說，上帝國並不同於任何世俗的政治體（王國、帝國或者現代國家）。黃伯和論述這個上帝國盼望，不在於一個「政治的彌賽亞」（政治領袖，例如：國王、君主、首相、總統等），而在於耶穌所示範、所建立的「彌賽亞的政治」。(1991: 192-194) 黃伯和論述：

從耶穌之『受苦的僕人』開展的一個新的救贖（解放）運動，乃是轉離猶太民族中心主義，甚至是轉離猶太教中心或基督教中心所了解的拯救觀點，而向眾生，就是受苦的人民大眾擁抱的拯救取向。而由這一拯救觀點所指射的上帝國，亦是以受苦人民之心靈為領土與關心的。(1991: 192)

在這一點上，黃伯和亦承襲了宋泉盛的故事神學與人民詮釋學最核心的關懷。綜上所論，黃伯和的出頭天神學並未強調「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主張，而以「人民自決」、建立人民主體性，並以宗教的終極關懷作為心靈改造、文化改造的動能。

四、建國神學

由抵殖民—人民自決運動所發展出來的政治神學，總共衍生出了五份宣言。除了三大宣言以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又在 1991 年發表了〈台灣主權獨立宣言〉，及在 2005 年發表了〈公義與和平宣言〉。前者除了明確主張「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主權獨立國家」外，更主張（1）制憲（2）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3）確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⁷ 後者則為前者的再度強調，

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主權獨立宣言〉，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51。

並呼籲制定「台灣國與中國關係法」。⁸ 1991年發表宣言的歷史背景主要是李登輝主政，國民黨廢除動員戡亂，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而後者的歷史背景是民進黨逐漸偏離「主權獨立」的路線，並且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

2007年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出版的《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是〈人權宣言〉發表三十周年所收集的聖經與神學論述。本書分成三大部分：歷史回顧、聖經與神學的反省、建構與展望。論述主軸延續〈人權宣言〉的核心主張「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連結聖經中的出埃及敘事，並且論述「鄉土和人權是上帝所賦予的權力」，將「獨立建國」看作是一種天賦人權。楊啟壽牧師即指出，「作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權利就是尊嚴和自由。有了這樣的人權，人才能當家做主做決定，一個國家的人民握有這樣的基本人權，這個國家才能稱為自由獨立的國家。」（林芳仲，2007: 117）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雖是以〈人權宣言〉做為核心開展其神學反省，但是「國家」的意象已經相當明顯。

繼人權宣言、鄉土神學、出頭天神學發表之後，《台灣建國神學》是具體化論述「國家」意象與內涵，並且與聖經的價值觀做連結的神學論述。有別於人權宣言、鄉土神學或出頭天神學，《台灣建國神學》對於國家意象的建構是相當鮮明且具體的。該書一共分為七章：包括「上帝創建國家」、「上帝所定民生經濟」、「上帝建立國民」、「耶和華的國防」、「合神心意的政府」、「國民告白與公約」、「台灣建國禧年」。

建國神學作者羅光喜牧師將「獨立建國」看作是去殖民化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任務，並且將台灣國家的建設工程視為尚未完成。他說，「只要台灣沒獨立建國，就仍沒有脫離四百年來被殖民的不幸，殖民者的不義與罪惡也持續著。」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壯大，新殖民主義仍可能重新在台灣社會復辟，因此，從抵殖民運動角度來看，獨立建國仍有其時代的必要性。（2018: 11）

羅光喜的建國意象主要來自於聖經以色列歷史中民族的解放的敘事。對羅光喜而言，民族解放不僅止於出埃及，更連結到以色列建國的完成。因此第一章即開宗明義的論述「國權」的神聖性，並且將「管理」、「治理」連結到創

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義與和平宣言〉，取自2020年10月31日，
<http://www.laijohn.com/PCT/Statements/2005-justice.htm>。

世紀敘事中，上帝創造本來就賦予人類「管理」、「治理」的任務做神學論述。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一章討論了兩種「人類管理的權柄」的政治論述—「君權神授說」、「天賦人權說」，將之視為聖經中同樣支持的兩種權力模式，對應於兩種不同的上帝特質。羅光喜認為，「君權神授」對應於上帝的父性特質，而「天賦人權說」則對應於上帝的母性特質，

但在基督教改革宗國度裡，因深體人之罪性而對人性極度悲觀不信任，大多避開君權神授的獨裁模式而走人權神授，大家共和來建立國家的分權模式。(2018: 35)

因此，就改革宗神學傳統而言，「天賦人權」是較為優越性的選擇。(2018: 17-57)⁹

那麼，地上建國的任務與耶穌所傳揚的上帝國，是否有衝突？羅光喜認為，以色列國的復興並未被否定。但是人民的任務在於，在世間的國度播種上帝國的價值觀，使之符合上帝主權統治的理想。羅光喜對於世俗國家的看法比較傾向於「兩個王國論」，亦即世俗國家有上帝授權的神聖性，但仍在上帝的主權管轄之下。人的責任除了要負起公民責任以外，對於基督徒而言，更有義務在人間國度播種上帝國的價值觀(2018: 57)。

從上述所定調的主軸，理想的世俗國度包含了幾個重要的元素：建立合神心意的政府、被神建造的國民、以及公平正義的民生經濟。作者引用改革宗加爾文的論述，認為教會與政府同樣是上帝邀請人民進入一個基督化社會的方法。政府與教會既不相屬也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分工合作的。人固然需要順服政府的權柄，因為權力自上帝而來；但是，如果政權已經顯露出敵對上帝的性格，人民則有權利反抗政權(2018: 207-271)。¹⁰除了引用加爾文傳統，羅光喜也引用「錫安彌賽亞王權」、「西乃約法」、「祭司傳統」以及「各各他政權」等具有高度宗教象徵意涵的語言，來表達其所認為一個合乎上帝國價值觀的政權應具備的要素與意象(2018: 242-271)。

羅光喜將鄉土神學重要的主題「人民」以「國民」置換之，將人民放置在

⁹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一章，「上帝創建國家」內容。

¹⁰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五章，「合神心義的政府」內容。

國家的框架下做討論。羅光喜亦重視人性的改造，而他認為人性的提升唯有透過基督信仰方能達成。透過正確的信仰認知建立自信、有異象敢作夢的勇氣、在禮拜儀式中被建造、願承認過錯的贖罪反思機制來成為一群堅守公平正義價值觀的國民，達成「慈愛和誠實相遇、公義和平安相親」、具有博愛精神的國民（2018: 108-152）。¹¹ 而這樣的政府與國民，方能承擔公民責任，形成社會共識，推動制憲正名工程，遵守社會公約，並且負責任地加入國際社會，促進國際公義（2018: 277-325）。¹²

羅光喜書中論述的民生經濟帶有「福利國家」的色彩。理想的經濟制度應該是注重分配正義、居住正義、照顧弱勢者，以及注重勞權。羅光喜特別提出「母性上帝優先原則」，他認為經濟首重濟弱扶貧，而非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競爭邏輯。強者分享原則之下，應該對於富人增加稅收，強化醫療保險、健全社會福利與失業救濟制度（2018: 63-102）。¹³ 羅光喜的建國神學最有特色的部分，應是將基督教聖經從未被實踐過的「禧年理想」以專章討論：豁免債務、救濟貧窮、土地休耕、物資共用，以及基督徒最激進的主張：土地重分配機制（2018: 336-358）。¹⁴

總上所述，羅光喜的建國神學是首部鉅細靡遺地詳述國家內涵的神學著作。雖然裡面不乏具有爭議性的國防論述、帶有侵略生態色彩的開山入海的經濟主張、錫安主義的疑慮，以及舊約聖經對於國權其實有著不同看法……等神學論述上的缺點，不過，其中也不乏基督教信仰中的烏托邦色彩，可以說是為台灣建國論述注入一股新的神學論述。

參、後殖民觀點的神學反思

長老教會由抵殖民抗爭運動發展出的政治神學，從一開始訴求「人民自決」轉向相當具體的「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可以說是有其歷史淵源。進入

¹¹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三章，「上帝建立國民」內容。

¹²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六章，「國民的告白與公約」內容。

¹³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二章，「上帝所定民生經濟」內容。

¹⁴ 參考《台灣建國神學》第七章，「台灣建國禧年」內容。

廿一世紀，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強權，台灣的國際地位仍然倍受擠壓，在帝國的陰影之下，國族抗爭必定繼續。長老教會的政治神學論述與其主張，即便帶著濃厚的台灣民族主義色彩，以及明顯的「國家」中心的主張，但仍然有其階段性的必要性。後殖民研究學者 Leela Gandhi 在一篇專文“*Imagining Community: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討論民族主義時，雖然也承認民族主義有其缺失，但是對於亞洲與非洲的抵殖民運動來說，建立獨立國家是一個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選項。(2019: 110-112)

然而，過度強調民族主義也有其危險性，包括了以民族主義之名合理化的暴力、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等。(Gandhi, 2019: 108) 其中一個重要的危險特別是，過度強調本土主義而走上了將差異本質化的路 (essentialization of differences)。吳叡人在其《受困的思想》中即指出：

台灣歷史之『連續殖民』與『多重殖民』特徵，意味著吾人難以使用單一觀點來界定台灣之『後殖民』：不同族群在重層殖民歷史結構中的位置深刻影響了該族群對『殖民』、『反殖民』、『去殖民』與『後殖民』意義的理解。(2016: 13-14)

以原住民族族群的角度來說，去殖民意味著擺脫數百年來在不同政權更迭下被宰制、剝削的底層附庸地位，達成民族自決／自治的目標。1999 年由民進黨總統人陳水扁與原住民族各族群簽訂的「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協定（於 2002 年再次肯認），可以說是一個原住民族去殖民化的象徵性起點。然而，民族自決的解放運動尚未完成。

2016 年八月一日原住民族日，總統蔡英文以總統身分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並且提出具體的八項承諾，包括「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啟動蘭嶼核廢料調查、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與海域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推動「原住民族法律扶助中心」，以及肯認平埔族群身分與權利等。¹⁵ 可以說，原住民族解殖民工

¹⁵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為什麼要道歉？蔡英文總統的九個理由與八項承諾」，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Page/18>。

程正式由國家啟動。

然而，在國家法律系統中去推動解構殖民工程，仍有不少的困難。例如，從 2017 年開始的原住民族抗爭，即是對於國家所訂定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中排除了私有土地所引起的爭議而發動的抗爭運動。可以說，雖然國家充滿了善意，但是，在一個以漢人為多數的社會，要去承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重新理解台灣的歷史正義與土地正義，還是一條漫漫長路。

在鄉土神學的論述中，雖然也有片段的論述觸及原住民族土地議題，不過，整體而言，並未系統性地論述原漢土地衝突背後的殖民深層結構，以及將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滄桑史視為台灣人民集體殖民創傷的一環。以玉山神學院為首的神學工作者雖然有對於原住民族土地、身分認同、自決／自治等議題作出系統性的論述，但是，尚未被看重、也沒有被整合到以漢人為主體的國族論述當中，並且作出適當的神學反省。2016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支持原住民恢復權利與自治』決議文〉，¹⁶ 長老教會終於正視原住民族宣教過程中對原住民族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再次肯認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支持，可以說是推動轉型正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018 年所出版的《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是長老教會界開始反省基督教神學轉型的起點，¹⁷ 與註腳所列出版年代不同，請作者查詢 然而，轉型正義的任務相當艱鉅，仍有待有志者一同努力。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與價值系統中，蘊含著豐富而大量解構殖民主義思想的元素，如果能夠適當地汲取原住民族文化思想的元素，對於解構殖民主義的餘毒能夠有莫大的幫助。例如原住民族傳統中的「好客」與「分享互助」精神，與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相呼應，有助於消弭漢人移民社會在殖民歷史中不斷爭奪、械鬥的歷史創傷。原住民族土地觀中對待土地如同母親、對待其他受造物如親戚朋友的思想，對於主流社會把「土地」工具化、資

¹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支持原住民恢復權利與自治』決議文〉，取自 2020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pct.org.tw/news_pct.aspx?strBlockID=B00006&strContentID=C2016102100003&strDesc=&strSiteID=&strPub=&strASP=。

¹⁷ 施正鋒、邱凱莉編，《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台北：翰蘆出版社，2018）。

本化而造成的土地傷害有修正的力道。而其世界觀中非人類中心的思想，能夠幫助減緩由人類集體自相殘殺、造成地球性大規模的毀滅所帶來的死亡誘惑。（Chiu, 2014: 306-315）

對於長老教會而言，新的政治神學課題，必須將新的台灣實況考慮進來，人民自決的主張不能夠淪為漢人中心的人民自決，也必須重視原住民族自決運動所提出的訴求及其背後的神學意涵；「新而獨立」的國家訴求固然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但是，也必須在不斷更新的台灣實況中繼續不斷去探討何謂「新」國家意象？

黃彰輝所開啟的「實況化」神學方法，是必須在做神學思考時，與台灣文化、歷史產生有意義的關聯，並且考慮當時代的現況，才能夠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成為屬於台灣人的基督教神學。就當代台灣人來說，實況是非常複雜的。神學的任務是要不嫌麻煩地、不間斷地去質問：誰可以被稱作「台灣人」？原住民族、新住民、東南亞移民又如何形塑新的「台灣人認同」？即便是認同自身作為台灣人的群體之中，不同的性別、社會階級、年齡層，是否會因著其被壓迫經驗的差異而對台灣實況產生不同的理解？台灣人如何看待殖民帝國在台灣留下的影響與精神資產？

如果要避免將「差異本質化」的問題，由抵殖民人民抗爭運動所發展出的國族論述以及政治神學中，無可避免的問題，是要不間斷地回到「台灣實況」，嚴肅看待台灣歷史中由連續殖民與多重殖民體制所引發的差異化的被殖民創傷經驗，透過嚴謹的實況分析以及相應的神學反省，才能為新一代的政治神學開創新路。甚至，解殖民的神學任務也包括想像力的解殖民——除了現代民族國家以外的政治組織、政治聯盟，或者在獨立國家基礎之上的各式各樣的人民結盟，能夠與基督教聖經的價值觀呼應的政治連帶（political solidarity），而不要把台灣人民解放的選項侷限在「獨立國家」。

事實上，殖民化的過程其實相當複雜，解殖民的工程也顯得困難而艱辛，並不是把殖民威權體制涉及的一切全數扔掉就能夠達到解殖民。因為，即便能夠指認哪些是外來的元素，這些元素也已經與本土可相容的部分重疊交織再一起，以至於無從分解。後殖民研究學者皮埃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巴雷克（Bhikhu Parekh）認為，

解殖民所需要作的，絕不是回憶殖民年代以前被標榜為源遠流長、連綿不斷的純正傳統，而是要富於想像力地去創造新的自覺意識和生活方式。（2002: 75）

想像力的解殖民一向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解放涉及去除殖民者所輸入的、強加在殖民地身上的集體意識與社會意象，而以自由的集體意識與社會意象取代之。如果沒有凝聚性的社會意象，就不能發揮匯聚群體的力量，無法達到解殖民的目的。（皮埃特斯、巴雷克，2002: 79-80）宗教信仰在提供凝聚性的社會集體意象方面，應該是具有巨大潛力的。特別是基督教信仰中豐富的敘事，對於耶穌基督這位解放者的危險記憶，以及聖經中上帝屢屢介入以色列歷史中施行拯救與解放工作的敘事，能夠提供豐富的題材，作為台灣人民解構威權殖民統治政權的素材，匯聚社會力量，重塑集體意識與文化意象，帶領台灣繼續走在「出頭天」的道路上。

輔仁
宗教研究

參考文獻

- 王憲治編（1988）。《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台南：台南神學院。
- 吳叡人（2016）。《受困的思想》。新北市：衛城。
- 李筱峰、薛化元（2019）。《典藏台灣史：(七)戰後台灣史》。台北：玉山社。
- 宋泉盛編（1988）。《出頭天—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史料》。台南：人光。
- 林芳仲編（2007）。《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
- 施正鋒、邱凱莉編（2018）。《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台北：翰蘆。
- 陳芳明（2011）。《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
- 陳南州（2003）。《認同的神學》。台北：永望。
- 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1996）。《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 蔡榮芳（2020）。《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台北：玉山社。
- 黃伯和（1991）。《奔向出頭天的子民》。板橋：稻鄉。
- 黃信恆(1988)。〈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鄉土」含義之探討〉。《台灣鄉土神學論文集》，王憲治主編，頁383-412。台南：台南神學院。
- 鄭仰恩（2005）。《定根本土的台灣基督教》。台南：人光。
- 羅光喜（2018）。《台灣建國神學》。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 皮埃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巴雷克（Bhikhu Parekh）着，吳江波譯、許兆麟校。〈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許寶強、羅永生編（2002）。《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Chiu, Kai-Li.（2014）. *Emancipation and Indigenous Taiwan: A Postcolonial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HUT-THÁU-THI*ⁿ. Ph.D. dis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 Coe, Shoki.（1980）.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ation.”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Edited by Douglass J. Elwoo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 Gandhi, Leela.（2019）.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omba, Ania. (2015).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Scott, Peter and William T. Cavanaugh, eds. (2004).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Malden, Mass.: Blackwell.

Sugirtharajah, Rasiah S. (2003). *Postcolonial Reconfigurations: An Alternative Way of Reading the Bible and Doing Theology*. St. Louis, MO: Chalice Press.

Taylor, Mark Lewis. (2011). *The Theological and the Political: On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Taylor, Mark Lewis. (2013). "Political Theology: Reflecting on the Arts of Liberating Politic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ublic Intellectual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Ada María Isasi-Díaz, Mary McClintock Fulerson, and Rosemary P. Carb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台灣地區解嚴令」，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16>（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1（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們的呼籲〉。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3（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05（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主權獨立宣言〉，

http://www.pct.org.tw/ab_doc.aspx?DocID=051（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義與和平宣言〉，

<http://www.lajohn.com/PCT/Statements/2005-justice.htm>（取自2020年10月31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支持原住民恢復權利與自治』決議文〉，

http://www.pct.org.tw/news_pct.aspx?strBlockID=B00006&strContentID=C2

從人民自決到獨立建國：
以後殖民觀點分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解嚴後三十年發展 145

[016102100003&strDesc=&strSiteID=&strPub=&strASP=](#)（取自2020年10月31日）。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為什麼要道歉？蔡英文總統的九個理由與八項承諾。」<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Page/18>（取自2020年10月31日）。

輔仁
宗教研究

From 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to Independent Nation-building: A Postcoloni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Theologi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30 Years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CHIU Kai-Li

Assistant Professor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Abstract

his essay aim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tifs in the political theologi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The author analyzes four key texts: *Essay Collection on Taiwan Homeland Theology* (Wang, Hsien-Chih ed, 1988), *The People Who Pursue Chhut-Thâu-Thiⁿ* (Huang, Po-Ho, 1991), *Theology of Indentification* (Chen, Nan-Jou, 2003), *The Theology for Taiwan's State Building* (Lo, Kuang-Hsi, 2018).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PCT's long-term involvement of the i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elucidates how the PCT Church developed the theological discourse of liberation from Exodus narratives in the Bible, contributing to the deepening of local identity and the shaping of Taiwanese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how the political theologi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have evolved from the broader ideals of liberation to the narrowed-down ideal of the nation-state-building, discoun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hap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people's minds.

This article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political theologi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criticism of the essentialization of differences in the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movement. Moreov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future political theologies may includ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fering new religious images to condense society's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de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Keyword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olitical Theologies, Postcolonialism,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dependence Movement